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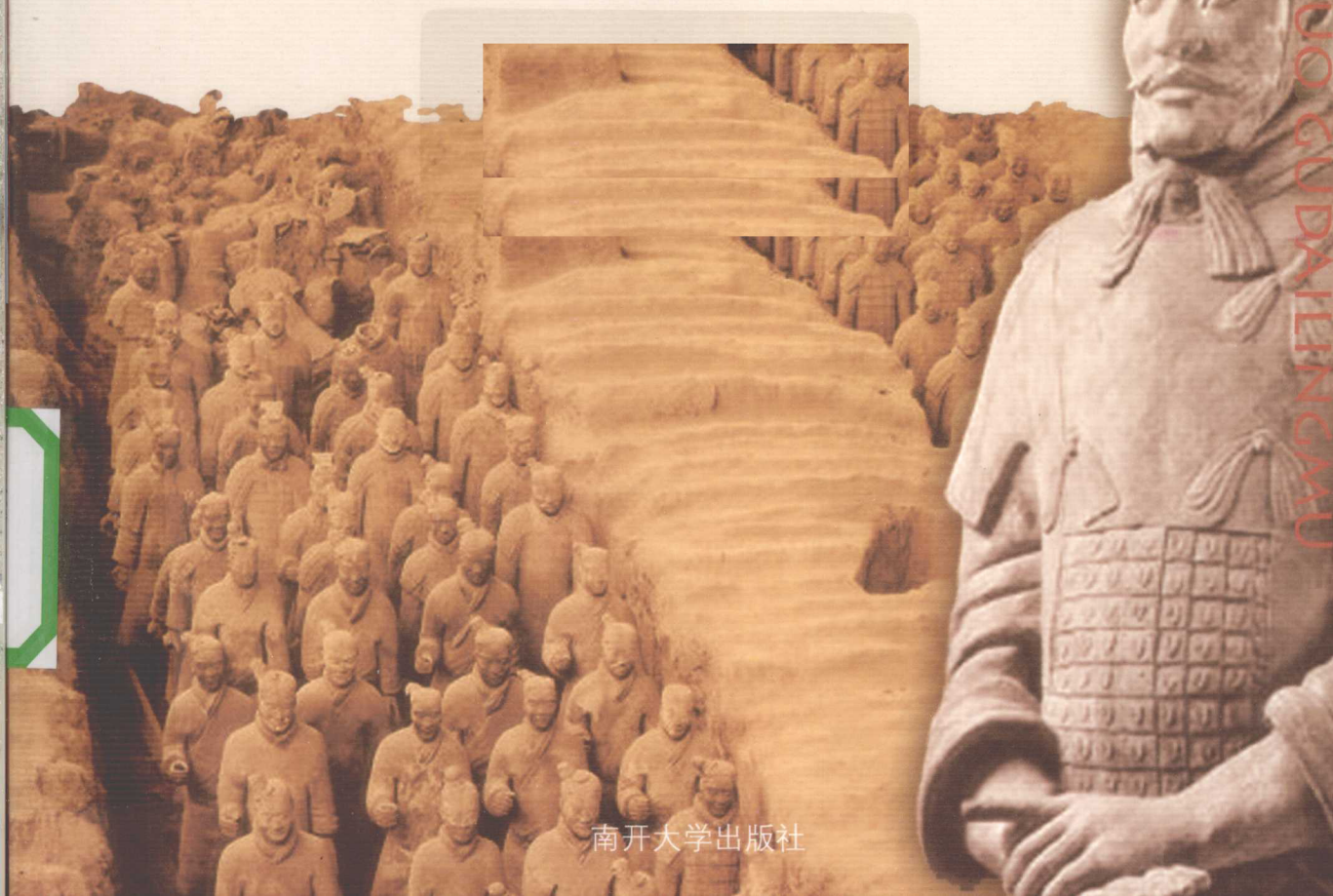
Zhongguo Lishi
Wenhua Dajiangtang
Wenbo Xilie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 • 文博系列

刘毅 总主编

中国古代陵墓

刘毅 著



ZHONGGUO GUDAILINGMU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

刘 毅 总主编

中国古代陵墓

刘 毅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陵墓 / 刘毅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5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学. 文博系列)

ISBN 978-7-310-03408-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陵墓(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76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总 序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第一批推出《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紫砂器》、《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古代陵墓》，共八种。它们是关于上述诸门类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概述性著作，大都是以各位作者各自的授课讲义为基础整理修订而成，其基本属性是大学本科专业教材。

南开历史学科有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学专业的郑天挺教授曾经在 1960 年代初担任全国文科教材历史组的主要负责人，主持史学教材选编工作；本专业的首任主任王玉哲教授不仅有专著《中国上古史》传世，还在 1980 年代末组织骨干教师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教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国内各高校文博考古专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教材编纂的耗时费力是有经历者所共知的。一部好的教材，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合理的编排结构；对于原始数据的利用，应该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清晰合理的思路来统帅编排，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行文要符合教材的特点，深入浅出，并尽量适应读者群的需要；还特别要注意学术观点的普适性（不一定是作者本人或作者所赞同的），而很多涉及的问题也不能深入展开，只宜点到为止；一些新兴的学科门类或分支的教材，还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专著几无差异。同样地，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进入不同学科领域的最佳引路者，有些不但能使读者得其门径，还可能使之受益终身；教材的编纂，能够不断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使课程体系乃至整个专业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发端于 1960 年代初，1979 年 9 月重新组建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1980 年秋季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是全国同类专业中创办最早的。专业创办之初，在课程设置、讲授内容等方面均无成宪可循，文物考古类课程则先后聘请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现天津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专家讲授。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本系教师已经相继自己开设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陶瓷器”等课程，它们以及稍后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建筑”等，有不少在高校相同或相近专业中都属首

创。今年是南开大学文博专业正式创办 30 周年，通过 30 年间几代教师的不懈努力，文博类课已经在南开大学栽植成功，师资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受中国文物研究传统的影响和中国博物馆发展现状的制约，文物考古类课程在各高校文博专业课程中都占有很大比重，南开大学文博专业也不例外。这类课程一直是我们的教学重点，讲义等基本教学数据也最为完整。这套《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虽然不完全是教材，但它们毕竟是以讲义为基础编纂而成，其突出特点是知识体系完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时下坊间有关文物考古鉴赏类、知识普及类图书不少，但精品不多。教材比专门考古报告的不同之处，是它的全面性和突出重点、简明扼要；而比普及信息类书籍的不同之处，是其科学严谨，在资料翔实可靠、准确深刻等方面，更为一般介绍性著述所无可比拟。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的构想最初由莫建来先生提出，后经反复协调筹划，决定由我组织先期编纂第一辑八册，作者以本系教师为主，也有现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原本系博士生和研究生。希望这八册只是一个开端，这套丛书今后能够继续编辑出版；其内容将不再局限于不同门类的文物，形式也将不仅局限于教材；除本系教师以外，作者还将逐渐扩大到其他曾经在南开文博系（专业）工作过和学习过的人，以及所有南开文博的有缘者。

刘 毅

2010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陵墓的概念和研究范畴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发展变化的分期	4
第一期：发端起源时期（商至东周早期）	4
第二期：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晚期至秦代）	5
第三期：发展和完善时期（两汉）	6
第四期：衰微到逐步复兴时期（三国至隋代）	7
第五期：高度发展时期（唐代）	8
第六期：停滞时期（五代至元代）	9
第七期：全新发展和集大成时期（明清）	11
第三节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基址的卜选规则	12
一、地理因素	12
二、风水因素	12
三、政治因素	13
四、礼制因素	14
第四节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方法	15
第五节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的学术意义	17
第一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端起源（商至东周早期）	18
第一节 崇功报本的纪念性上古帝王陵墓	18
第二节 传说之三代王陵的辩证	22
第三节 商周时期的木椁结构王陵	25
第四节 关于“不封不树”之制的讨论	27
第五节 关于“墓祭”问题的讨论	28
第二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初步形成（春秋晚期至秦）	31
第一节 墓葬封土的出现及其原因	31
一、墓葬封土的出现	32
二、封土墓出现原因推测	33
第二节 春秋战国封土王陵概况	34

第三节 战国中山王陵陵园制度	37
第四节 秦公大墓和秦始皇陵陵园制度	39
第三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两汉）	45
第一节 汉代皇陵概况	45
第二节 西汉皇陵制度	48
一、西汉皇陵的陵园制度	48
二、西汉皇陵的埋葬制度	50
三、西汉陵寝的祭祀	57
第三节 东汉皇陵制度	59
一、东汉陵寝制度的变革	59
二、东汉皇陵的祭祀	62
第四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衰微到复兴（三国至隋）	65
第一节 魏蜀吴三国陵寝制度	65
一、魏国陵寝制度的废除	65
二、蜀、吴二国的帝王陵墓	67
第二节 晋代皇陵制度	68
一、西晋五陵	68
二、东晋皇陵制度	70
第三节 南朝皇陵制度	72
一、南朝皇陵概况	72
二、南朝皇陵制度的特点	73
第四节 北朝皇陵制度	77
一、北魏早期皇陵制度	78
二、北魏晚期皇陵制度	80
三、北朝晚期皇陵制度	82
第五节 隋代陵寝制度	84
第五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高度发展（唐代）	87
第一节 唐代皇陵概况	87
一、关中十八陵	87
二、追尊祖陵和“号墓为陵”	89
三、唐陵的规模	90
四、唐陵陪葬制度	91
五、唐陵的祭祀	93
六、唐陵的调查和研究	96
第二节 唐代皇陵的陵园结构	98
一、乾陵陵园结构	98

二、唐陵神道石刻制度的演变	100
三、唐陵寝宫制度	102
第三节 唐代皇陵玄宫制度	103
一、靖陵玄宫制度	104
二、“号墓为陵”的乾陵陪葬墓玄宫制度	104
第六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停滞徘徊（五代至元）	107
第一节 五代十国帝王陵墓制度	107
一、五代的皇陵	107
二、南唐皇陵	110
三、吴越王陵和王妃墓	111
四、前后蜀皇陵	112
五、南汉皇陵	113
六、闽王陵	115
第二节 两宋皇陵概况	115
第三节 北宋皇陵的陵园结构	117
一、北宋皇陵的陵园和石像生制度	117
二、北宋皇陵的下宫	119
第四节 北宋皇陵玄宫制度	120
一、元德李后陵玄宫制度	120
二、石藏（石槨）制度	122
第五节 南宋皇陵制度	124
一、南宋皇陵的陵园结构和位次	124
二、南宋皇陵的石藏	126
三、南宋皇陵的彻底破坏	127
第六节 宋代皇陵制度的特点	128
第七节 辽代皇陵制度	132
第八节 西夏王陵制度	135
第九节 金代皇陵制度	138
第十节 元代的皇陵	142
第七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全新发展（明代）	145
第一节 明代皇陵的建置沿革和基本特征	145
一、明代皇陵的建置沿革	145
二、明代皇陵制度的基本特征	147
第二节 明代皇陵陵园制度	148
一、凤阳皇陵和盱眙祖陵	148
二、南京孝陵	150
三、北京长陵	153

四、北京昌平陵区诸陵	156
五、景帝陵和显陵	158
第三节 明代皇陵玄宫制度	159
一、明神宗定陵玄宫的结构	159
二、关于明代皇陵玄宫结构的演变	162
第八章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集大成（清代）	165
第一节 清朝皇陵概况	165
第二节 清初三陵园制度	166
一、清初三陵	166
二、清初三陵制度特征	171
第三节 清代关内九陵的陵园结构	172
第四节 清代皇陵玄宫制度	178
第五节 明清陵寝制度的异同	180
附录一 基本名词	185
附录二 古代陵墓研究主要参考书目	188
附录三 古代陵墓研究常用专业期刊	193
后记	194

导 论

陵墓是中国古代墓葬之一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①简单地说,“葬”是处理尸骸的方式,“墓”是葬地的标识形式;而“陵墓”或“陵寝”则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墓葬的一种特殊称谓。中国古代陵墓研究,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墓葬的特点及与之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分析探讨。

第一节 中国古代陵墓的概念和研究范畴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本内涵可以分解为“陵”、“寝”、“庙”三个概念来理解。

1. “陵”

“陵”字的本意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成语有“陵谷之变”即用此义。东汉应劭考证说:“《诗》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春秋左氏传》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崤在弘农渑池县,其语曰:‘东崤西崤,渑池所高。’《国语》:‘周单子会晋厉公于加陵。’《尔雅》曰:‘陵莫大于加陵,言其独高厉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坟墓各称陵也。”^②这段话把“陵”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辨析得很明白,并特别指出当时(汉代)王公坟墓各称“陵”。北魏酈道元引《三秦记》考证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③此后,沿袭应劭和酈道元之说者不乏其人,都认为汉代高坟大冢始称“陵”。

事实上,“陵”字派生出“墓地高大封土”之义已见于先秦,而不是始于汉代。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因其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④顾亭林以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为以“陵”指称高坟大冢之首见,亦即认为“陵”这一名称

①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制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②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一〇,“山泽·陵”,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中华书局剑楼藏元大德本,第7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一九,“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本,第460页,中华书局,2007年。

④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陵”,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始于战国时期。清末俞樾又根据《汉书·地理志》中“河东郡·襄陵”条下唐颜师古注：“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陈留郡·襄邑”条下颜师古注：“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等两条资料^①，认定：“春秋之世已有陵名。”^②考晋襄公骊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八月，宋襄公兹父卒于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7年）五月，如颜注无误，则至迟公元前7世纪晚期已有以“陵”名诸侯墓之例。

从前哲的考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陵字由高大山丘之本义，不晚于春秋战国时衍生出高大坟冢这一新涵义，此义系因高坟大冢堆土象山的实际面貌引申而来。从汉代起，“陵”开始成为帝王墓葬的特定称谓，如高祖墓称“长陵”，文帝墓称“霸陵”等，是陵字又从单纯的封土象山之义扩充为指代帝王墓葬之全部及其附属设施。

2. “寝”

“寝”字的本义是指古人正规的或最主要的起居处所，成语“寿终正寝”即用其义。“寝”在“堂”之后，正规的堂、寝之间还应该以门相隔，“寝门”之名数见于《仪礼》、《礼记》等典籍，如《仪礼·士昏礼》谓：“妇至，主人揖妇以入，及寝门，揖入，升自西阶。”^③帝王则专门辟有寝宫，以与受朝办事之“殿”、“朝”相对应，帝王所居若多的寝宫具体又可以分为“露寝（正寝）”与“小寝”等。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礼也”^④，因而也在宗庙中、陵园内为先人设置了“寝”和“便殿”，而且在寝中要如待生者一般服侍先人。汉代皇帝陵园中的寝要“日上四食”，唐儒颜师古认为：“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⑤汉诸陵之寝中不仅要供奉饮食，而且还要“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⑥，寝中有宫人等人役应差，完全如墓主生时一般。此制唐宋相沿无改，陵上之寝名曰“下宫”。至明初，明太祖下令取消了皇陵中寝的建置，这便是顾炎武之所谓“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⑦，是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 “庙”

“庙”字的本义是指宗庙。上古自天子至士皆可育庙，用于崇祀祖先；后代庶人亦可建造祠堂以祭享先人，这种祠堂，有时也称之为“家庙”，唐代颜真卿即有书法名作《颜氏家庙之碑》。天子的宗庙仿生前宫殿为之，规制崇宏，有象征朝堂的“庙”，还有象征露寝的“寝”。东汉末蔡邕认为：“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⑧据此可知，在上古时代，“庙”与陵墓应该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事物，并且，墓的地位要逊于庙。《礼记》

①汉·班固：《汉书》卷八二上，《地理志第八上》（唐·颜师古注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6册，第1551、15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清·俞樾：《〈日知录〉小笺》，“陵”，影印《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本，附载影印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32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仪礼·士昏礼第二》，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仪礼注疏》卷五，第966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④《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五年》，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九，第2174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⑤汉·班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0册，第311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⑥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见宋·曹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200页，中华书局，1965年。按，“严”即“妆”，避汉明帝讳庄改。

⑦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墓祭”，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⑧汉·蔡邕：《独断》卷下，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记录了孔子和曾子的一段问答,可以证明这一点。“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东汉郑玄在“望墓而为坛以时祭”句下注释曰:“不祭于庙,无爵者贱,远避正主。”^①从这段对话及其注释中,可以明显看出上古之“庙”在正规的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为墓所难望项背。

秦火以后,古礼不尽传于世,西汉列帝皆各自在陵旁立庙,但这种“庙”仍然是上古意义的宗庙,而不是陵园本身的设施^②。东汉明帝把“西都旧有上陵”之礼制度化,届时,“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武行之舞。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③。这种仪式与以往陵园中寝殿内的“上食”之礼不同,而是“如会殿前礼”^④,亦即模拟朝会仪式。从此,陵园中的主体祭祀建筑——“寝殿”或“石殿”开始具有了一部分宗庙的功能。

不晚于两汉之交的文献中已经有了“陵”、“庙”并称的用法。如《汉纪》记载: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丞相韦贤病故,其子韦弘“为太常丞,贤以弘当为嗣,太常职当陵庙,烦剧多过,勅令自免”^⑤。又如《后汉纪》记载,明帝于永平二年(59年)十月“甲子,幸长安,祠陵庙”^⑥。“陵”、“庙”并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陵地位的提高。此后,唐宋陵园中的“献殿”、明清陵园中的“祔恩殿”、“隆恩殿”等作为陵园中的主体祭祀建筑,都沿着东汉以来强化陵上政治性祭祀的方向继续发展。“陵上之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与宗庙的祭祀方式也越来越相近似;在这种制度、观念变化的背后,是皇陵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一定程度上看,明清皇陵中的享殿或曰献殿,具有和国都中太庙(宗庙)相同的实用功能和政治象征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概括性的结论,即:“陵墓”是一个特称名词,它专指中国古代帝王的墓葬,其内涵不仅包括埋葬的本体,还包括了地面陵园建筑和其他一切附属设施(因为陵上寝宫也是陵园建筑的一部分,所以本书一般用“陵墓”而不用“陵寝”来表述)。陵墓制度则是历代帝王墓葬及其附属设施和各种规范的总和。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陵园地面建筑、地下椁室或玄宫建筑以及附属的石像生、碑刻等,属于凸显于表层的物质层面,而墓地卜选规则、墓主葬式、陵园布局和玄宫结构特点所映射出的思想观念等,则属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以历代帝王陵墓为基本研究对象,探究历代帝王陵墓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之轨迹。这一领域应该有两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一是地面陵园制度,包括陵园结构、祭祀建筑使用制度以及相关的陵园总体规划、祔葬墓和陪葬墓布列制度等;其二是地下埋葬

①《礼记·曾子问第七》,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礼记正义》卷一九,第1399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②西汉之宗庙初建于长安城南,至惠帝时以每月“游衣冠”不便等原因,采纳叔孙通之议,迁高祖之“高庙”重建于渭水北岸,因称“原庙”。“原”者,再也。景帝以后诸帝皆于陵旁立庙,相因无改。参见刘庆柱等《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③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03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④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二,《显宗孝明皇帝》,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本,第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汉·荀悦:《汉纪》卷一七,《孝宣一》,地节三年五月甲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册,第36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⑥晋·袁宏:《后汉纪》卷九,《显宗孝明皇帝纪》,永平二年十月甲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册,第59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制度,如棺槨制度、玄宫制度以及葬式和殉葬、祔葬之制等。除这两项主要研究内容外,还应该兼及一些与陵墓規制有较密切关系的问题,如身份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灵魂观念以及宗庙、宫室制度等。陵墓制度本身的研究重点应该在于物化层面,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则用于辅助解释系统。杨宽先生曾经认为:“所谓陵寝制度,就是把远古流行的在墓地上建屋献食的礼俗,加以固定化和扩大化而已”^①,似乎将陵寝制度的研究范畴限定得过窄。

第二节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发展变化的分期

按照古史传说,中原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时已经产生了帝王制度,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所谓“三皇”、“五帝”。后来禹之子启继父而立,建立夏朝,是为帝王“家天下”之始。夏代及其以前的个别王陵在先秦史籍中有零星的记载。现在虽然能见到一些传说时期和夏商两代的古帝王陵墓,如河南淮阳的伏羲陵、湖南酃县的炎帝陵、陕西黄陵的黄帝陵、山东曲阜的少昊陵、河南濮阳的颛顼陵和帝喾陵、山西临汾的尧陵、湖南宁远的舜陵以及浙江绍兴的夏禹陵、安徽亳县的商汤陵等,但基本都是后世为追怀圣王功德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不一定是这些古帝王的真正藏骨处。因此,这些所谓的“圣王”陵墓,并不能用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信史资料。

迄今为止,能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古帝王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西北岗一带的商代晚期的商王陵和商王族墓。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古帝王陵寝制度研究年代的最上限。从商代晚期到清代,中国古帝王陵墓的发展可以分为七期。

第一期:发端起源时期(商至东周早期)

殷墟商王陵为土坑竖穴式,分为“亞”字形(四条墓道)、“中”字形(两条墓道)两种形式,其他王族成员则有“中”字形墓和“甲”字形墓(一条墓道)等墓葬形式。商王陵中陪葬品丰厚,而且还有殉人、殉牲。墓穴之上没有封土,但在侯家庄等地一些大墓和小屯村妇好墓的墓口之上却发现同期的建筑遗迹^②。关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的功用和性质,有人认为应该是“寝”^③,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名曰“宗”,是享堂^④。

西周王陵至今未能确认,从司马迁《史记》和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以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孙星衍《皇清经解》等文献中的考辨来看,今陕西咸阳原上的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周陵”实系讹传;现代考古调查表明,它们应该分别是战国秦惠文王、悼武王陵以及若干汉陵的皇后陵或陪葬墓^⑤;西周王陵应该在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即周都丰、镐遗址附近。但也有人根据陕西周原的有关考古发现,认为西周王族墓地可能在周原黄堆一带,“寻找西周王陵,应当把黄堆作为主攻方向”^⑥;2004年春,陕西岐山县凤鸣镇周公庙一

①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台北,1962年;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

④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

⑤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⑥罗西章:《西周王陵何处觅》,《文博》1997年第2期。

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群,其中有“亞”字形大墓,因而有人认为与西周王陵有关^①;但这些都还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西周王陵和商王陵一样,地表也应该是“不封不树”的。

东周王陵在今洛阳附近,考古调查、钻探资料表明,东周王陵分为周山、王城东北、金村三个陵墓区^②,其中周山王陵区经过调查和重点钻探,初步推测其中的4座封土墓为周灵王陵等东周王陵^③。根据有关资料研究,东周诸王陵的地下结构应该与商王陵相同,为土坑竖穴式木椁墓。1957年在洛阳王城东北钻探出4座规格很高的“甲”字形东周大墓即为此种结构,其中一座墓曾遭两次盗掘,清理出的残存随葬品中有带“天子”字样的石圭^④。2001年在洛阳西工区27中内发掘过一座“亞”字形大墓,出土铜鼎上有“王作宝尊彝”铭,初步断定为周王墓;2002年在洛阳中州中路与金谷园路交汇处发现有六马驾车的车马坑,在其西南曾探出大墓一座,也为东周王陵的调查确认提供了重要线索^⑤。

第二期: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晚期至秦代)

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有了清晰的发展序列,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封土墓的出现。中原地区王侯贵族墓上开始出现封土是在春秋晚期,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大墓,封土高7米,直径55米,该墓所在地为吴楚交界处,墓主应系吴或楚国的贵族^⑥。1992—1995年,江苏苏州浒墅关相继发现了2座春秋中晚期和3座战国晚期的封土墓,其中D9M1的墓主推测为春秋中晚期的吴王寿梦^⑦。战国时期,封土墓日渐普及,在今河北易县和邯郸、山东临淄、陕西咸阳、湖北江陵、浙江绍兴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巨大封土堆,它们分别是燕、赵、齐、秦、楚、越等国的王陵所在^⑧。这些封土堆由夯土筑成,最高的可达10余米,封土的形状,有的呈方锥形,有的原形已经难于判定,有些陵墓的封土堆上还明显地残留着同期建筑的遗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𰔰墓中出土的“兆域图”展现了中山王陵地面建筑的情况^⑨。这件“兆域图”的出土表明战国时期不仅在王侯埋葬处的地表上出现了封土标识,而且还兴建了规模宏伟的陵园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陵墓的墓室结构仍因袭前代,采用土坑竖穴,开辟墓道,或一或二,还有些不设墓道,墓坑内为棺椁结构。除土坑竖穴外,还出现了开凿岩石为墓穴的特殊做法,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穴系开凿于丘陵的岩石中,墓室形状亦不规整^⑩。位于陕西临潼的秦

①周原考古队:《周原李家楼铸铜作坊遗址发掘和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第1版;周公庙考古队:《岐山县周公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第391—39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80—82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印行,1985年。

③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调查记》,《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④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

⑤刘富良等:《洛阳,从车马坑找到东周王陵》,《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俞凉亘:《洛阳市东周王城》,《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253—25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大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⑦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⑧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张学海:《田齐六陵考》,《文物》1984年第9期;李兆华:《荆门发现楚大型陵园建筑》,《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4日第1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𰔰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⑩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始皇陵经过历年的勘察,陵园及附属建筑的布局正在逐渐廓清,陵园及周围发现有大型兵马俑坑和大量珍贵文物^①。秦始皇陵是秦代以前陵墓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秦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墓。它是先秦陵墓制度的最高级示例,确定了秦以后陵墓制度的基本框架。

第三期: 发展和完善时期(两汉)

汉代皇陵因袭秦制,在制度上有所简省亦有所变化发展。西汉十一帝,葬于渭水北岸咸阳原上者有九帝,自西而东依次为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成帝的延陵、平帝的康陵、元帝的渭陵、哀帝的义陵、惠帝的安陵、高祖的长陵、景帝的阳陵。另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两陵在长安城东南。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对于长安城周围的西汉诸陵及其附属建筑遗址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弄清了渭北九陵的排列次序,纠正了一些讹传^②;其中有些陵园如宣帝的杜陵^③、景帝的阳陵^④等还先后进行过钻探和局部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汉陵陵园结构已经基本清晰。

西汉皇陵未经发掘,地下墓室结构尚不清楚,但根据陕西栎阳汉太上皇陵钻探^⑤、北京大葆台汉燕王墓的发掘^⑥的结果分析,汉皇陵应为大型土坑木椁墓。墓穴之上建有高大的封土堆,为方或长方形覆斗状,一般高十二丈,武帝茂陵规模最大,高十四丈;文帝霸陵不起坟。诸帝陵域中还有阙、寝、便殿等地面建筑,在帝陵之东建有皇后陵,陵园外有助威陪葬墓,陵旁附设陵邑。各地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还有不少在山体中凿洞修建墓室的实例,如河北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⑦,山东曲阜九龙山汉鲁王墓^⑧,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王墓^⑨,江苏徐州狮子山^⑩、北洞山^⑪和小龟山^⑫等汉楚王墓^⑬,广东广州南越王墓^⑭等。

东汉时期的皇陵制度与西汉相比大同小异,但陵园结构趋于简化。自明帝开始在光武帝

①有关资料可参见王学理著:《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②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⑥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⑧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⑩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⑪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⑫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等:《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⑬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⑭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原陵上推行“上陵礼”之后，陵上祭祀活动和祭祀建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进而影响到唐宋以后的陵园建筑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东汉诸陵分别在东都洛阳城的东南和西北，按照文献记载：光武帝葬原陵、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和帝葬慎陵、殇帝葬康陵、安帝葬恭陵、顺帝葬宪陵、冲帝葬怀陵、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灵帝葬文陵^①，共有11座皇陵，另有少帝被董卓杀死，藁葬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圻中；献帝禅位于曹魏，死葬禅陵，在山阳郡（今河南省修武县北）。由于行政地理变迁和后人张冠李戴之误指，东汉十一陵的位次尚待确切考证^②；新近公布的一些考古调查资料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③。

第四期：衰微到逐步复兴时期（三国至隋代）

魏文帝曹丕鉴于东汉诸皇陵被盗掘、遗骸遭毁弃的惨状，加以担心树敌过多，为确保身后之安宁，乃实行薄葬，不封不树，亦不建寝庙等陵园建筑，地面不留痕迹。曹操原已按汉制以王礼营葬，至此亦撤除陵上之车马衣服等。蜀、吴二国除汉昭烈帝惠陵在成都^④、传说吴大帝蒋陵在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以外^⑤，其余诸帝陵虽有陵名记载，但具体位置已难确指。西晋五陵（包括追封的宣帝、文帝等）亦仿曹魏之制，不封不树，晋五陵地望在洛阳城东，其中文帝之崇阳陵经过发掘，武帝之峻阳陵经过铲探，二者均为规模稍大的土洞墓^⑥。东晋南迁，诸帝葬建康钟山西麓之阳，即今南京鸡鸣山、富贵山一带，其墓室结构为凿山成穴，砖砌单室券顶，多建有完善的排水设施^⑦。另有晋穆帝永平陵在南京北郊北固山，其结构与富贵山者相似^⑧。

南北朝时期陵园制度有所恢复，南朝宋、陈皇陵在今南京附近，齐、梁两朝皇陵在今江苏丹阳。从已经发掘的丹阳胡桥齐景帝修安陵^⑨、齐废帝东昏侯墓以及齐和帝恭安陵^⑩、南京西善桥陈宣帝显宁陵^⑪等实例来看，南朝陵墓的地下建筑与东晋相仿，为砖砌单室结构；但地面陵园建筑明显增多，墓上多筑有封土，并且陵前还辟有很长的神道，自陵墓所在的岗阜顺山势直抵平地，神道两侧置望柱、天禄、辟邪等石仪。南朝陵墓凭山而建，各抱地势，有些陵园朝向随山向背，不像汉陵那样都有固定的方向。

北朝统治下的北方陵园制度也有所恢复，北魏早期皇陵在代地，即今山西大同附近，其中文明太皇太后（孝文帝祖母冯氏）的永固陵经过发掘^⑫。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诸帝葬于

①关于东汉诸帝陵名称，各书记载不尽同，《后汉书》中也有缺载。此处据清代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一三、一四综合考证著录，见该书影印清道光刊本，第94—108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②黄明兰：《东汉光武帝刘秀原陵浅谈》，《中州今古》1982年第2期；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③韩国河：《东汉陵墓踏查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④一般认为汉昭烈帝惠陵在成都郊外，今武侯祠旁之土冢即是。曾有昭烈帝实葬奉节之说，否定成都惠陵之真实性，因而有人专门撰文论证成都惠陵之真，如梅铮铮等《对惠陵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清明子《读惠陵史料札记》，《四川文物》2001年第5期。

⑤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国事类·南都二墓》条有云“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排印本，第148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⑦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⑧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⑨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⑩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⑪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⑫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洛阳瀍水以西，仿汉制筑封土、建陵园，令功臣勋戚陪葬于瀍水以东。其中孝文帝的长陵经过勘察^①、新近的调查钻探又取得了重要收获^②，宣武帝的景陵经过发掘^③，有研究者对北魏诸帝陵的位次及相关问题做过比较系统的探讨^④。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诸皇陵各自在都城附近，东魏、北齐诸陵在邺城遗址以西，即今河北磁县漳河北岸，西魏和北周皇陵在陕西咸渭北原上。其中北齐文宣帝武宁陵^⑤、北周武帝孝陵^⑥经过发掘。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自立，继而以北朝为基础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卜寿陵于陕西扶风三畴原，名“泰陵”。泰陵经过调查^⑦，它以汉代皇陵制度为祖本，又兼采南北朝诸帝陵墓之所长，陵墓制度开始向复杂、完备发展。只是隋三代而亡，且炀帝死于非命，葬于扬州，未能完成这一使命。

第五期：高度发展时期（唐代）

唐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陵墓制度亦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高度发展。唐朝共有 21 位皇帝（包括武则天），末二帝昭宗李晔被朱温杀害于洛阳，葬和陵，哀帝李祝死于山东菏泽，葬温陵。其余 19 位皇帝均葬于汉陵以北的北山山脉附近，自乾县至蒲城，东西绵亘 150 余公里，号称“关中十八陵”。唐代诸陵做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其中有些陵墓还做过多次调查或局部清理发掘^⑧。诸陵的位次，自西而东依次为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僖宗的靖陵、肃宗的建陵、太宗的昭陵、宣宗的贞陵、德宗的崇陵、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高祖的献陵；庄陵、献陵一线以北自西而东为懿宗的简陵、代宗的元陵、文宗的章陵、中宗的定陵、顺宗的丰陵、睿宗的桥陵、宪宗的景陵、穆宗的光陵、玄宗的泰陵。

唐陵的建筑方式有两种，一是仿汉制封土为陵，如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另一种是因山为陵，即在山腰间开凿洞穴，在洞穴内构筑墓室。这种做法始于太宗营建昭陵，至高宗乾陵已基本确定规制。唐陵规模宏大，帝后同穴合葬，在陵山或封土的周围建有气度恢弘的陵园，陵山位于陵宫城内部正中，其南为献殿。陵城四面正中各辟一门，按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神方位命名。以朱雀门外为主神道，夹列石像生和蕃部客使等像。在陵宫（上宫）的西南方向约 2.5 公里处另建寝殿（下宫），供奉帝后灵魂起居

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 年第 3 期。

②朱亮等：《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调查钻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 年 1 月 7 日第 1 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 年第 9 期。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 年第 7 期；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 年第 7 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等：《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 年第 7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2 期。

⑦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⑧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 年第 4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 年第 1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 年第 7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 年第 1 期；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 年第 10 期；王世和等：《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文物出版社，1980 年；王仲谋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 年第 3 期；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 年第 6 期；刘庆柱等：《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5 辑，科学出版社，1987 年；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3 期；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 年第 4 期；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 年第 1 期；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 年第 3 期；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 年第 4 期；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 年第 1 期；秦建明等：《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 年 4 月 5 日第 1 版；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 1 期；王小蒙：《昭陵六骏的新出土》，《文物天地》2003 年第 8 期；昭陵考古队：《昭陵北门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3》，第 355 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